

酋邦与国家起源： 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段
渝
著

本书以文献考证和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并注意到古地质和古气候学成果在研究过程中的运用，详细解读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巴蜀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中、上游文化的性质、特点和差异，论述了长江上、中、下游地域性史前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巨大作用。

中 华 书 局

酋邦与国家起源： 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段 渝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段渝
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ISBN 978 - 7 - 101 - 05388 - 3

I. 酋… II. 段… III. 长江流域 - 文化起源(考古) - 对比研究 IV. K8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7459 号

书 名 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著 者 段 渝

责任编辑 陈 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印 数 1 - 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388 - 3

定 价 32.00 元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文化论坛》常务副主编，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出版《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三星堆文化》、《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古蜀文明》等学术著作20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序

考古学是一门对学者、专家和社会大众都富有吸引力的学科。尤其是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约 80 年间，提供出大量令人惊异的成果，致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全然改观了。

和所有的科学一样，考古学的目的也是探索和揭示未知的世界，只是这门学科所探讨的是已在时间上消逝的古代。时代距离今天越是遥远，考古学所能起的效用就越显重要。不只是在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古代都是这样。欧洲人讲的“近东”，即西亚到北非的古代文明，早已被湮没遗忘，人们的知识不过是《圣经》等古书里的零星片段。是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为掩覆过去的迷雾投射了光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一本名作，标题即是《上古东方的新光明》。

我以前说过，由于中国古代典籍繁多美备，有些人误以为我们的古史是清楚的，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落，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古史在文献中固有存在，但所能保留的讯息无多，及至上古更与神话传说纠合在一起，不易分辨了。这不是我们先人的过错，而是古代人类的定例，当时还没有文字或没有足够的文字，将其历史传流、记录下来。这种情形即使于古代的文化核心地带也是一样，至于位于文化主流之外的边远地区更不必说。

现在业已判明，长期被称为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严格说

是黄河中下游)，固然是虞、夏、商、周的建都之地，对于文明的形成、发展有特殊意义，但其他地区，特别是辽阔的长江流域，在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决不可低估，而这恰是所谓“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所排斥的。有关载籍文献本来就很稀少，仅能传留的一些，以往还每每为学者忽视甚至摈弃。重建长江流域古史的工作，比之中原地区更觉必要，也更是艰难。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近些年已经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绵远，地广人繁，如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指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将对整个人类历史法则的研究作出贡献。由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居重要地位，有关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文明起源与发展演进的问题，本身即具有理论的性质，因此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将历史学、考古学等整合起来，把大量事实、材料提升到理论的水平。段渝教授的这部《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段渝教授对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多年，其一系列专著、论文，主持的科研项目，组办的学术会议，均为学术界所熟知。当前这一新著，堪称他长期工作的综合总结，当然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并引起讨论。

“酋邦——国家”学说，是上世纪后半段产生、兴起的。以美国学者塞维斯等为代表的理论观点，逐渐传入我国，为学者注意和引用。段渝教授这部书，在借鉴、吸收“酋邦——国家”学说之余，还就有关方面做出推广和补充。相信重视理论的历史学、考古学界朋友们一定会对此给予关注。

李学勤

2006年12月14日

于清华园荷清苑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	9
一 中国文明起源的时空构架	9
二 中国文明起源的连续性问题	15
三 中国文明起源的内涵和特点	20
四 人口压力、空间限制与资源争夺	24
五 酋邦与国家起源的历史进程	37
第二章 长江下游的酋邦社会与国家起源	42
一 良渚文化的地域、年代和陶器特征	43
二 良渚文化墓地的分期与类型	49
三 良渚文化的遗址和墓地分区	51
四 良渚文化的时空演变	57
五 良渚文化酋邦社会的形成	60
六 良渚文化墓葬与政治组织的性质	103
七 良渚文化各区域中心的相互作用	120
第三章 长江中游的酋邦社会与国家起源	130
一 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聚落群	131

◆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二	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与聚落·····	138
三	长江中游的史前聚落与酋邦·····	150
四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苗·····	179
第四章	长江上游巴地的族群与酋邦社会·····	190
一	关于巴文化的几个问题·····	191
二	从部落到酋邦:清江流域廪君集团政治组织的演进···	206
三	峡江流域文明的起源·····	215
四	嘉陵江、渠江流域板楯蛮的政治组织·····	218
第五章	长江上游古蜀的酋邦社会与国家起源·····	227
一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相互关系·····	235
二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群与酋邦社会·····	243
三	三代蜀王与古蜀酋邦·····	255
第六章	金沙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	265
一	金沙江文化的定位·····	265
二	金沙江史前文化的流域形态及特征·····	268
三	金沙江青铜文化的流域形态及特征·····	273
四	金沙江文明的起源与演变·····	280
第七章	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文明差异	
	——巴蜀地区文明起源类型的比较·····	285
一	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的一般关系·····	286
二	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向心结构·····	287
三	巴蜀地区文化类型差异的生态原因·····	294
第八章	长江流域酋邦与国家的象征系统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政体	
	性质之比较·····	300
一	权力象征系统与政治组织和政体·····	300

二	三星堆文化青铜雕像的象征系统·····	302
三	三星堆文化青铜神树的象征系统·····	324
四	三星堆文化金杖的象征系统·····	328
五	金杖与九鼎的象征系统比较·····	332
六	良渚文化玉琮的功能和象征系统·····	338
第九章 长江流域酋邦的盛衰兴灭		
	——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进程走向的比较·····	355
一	良渚文化酋邦的中衰与消亡·····	357
二	石家河文化酋邦——三苗集团的衰落·····	365
三	战争与长江流域酋邦的兴灭·····	384
第十章 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化		
	——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实例·····	396
一	古蜀王国的国家与文明·····	397
二	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化机制·····	402
三	神权国家的运作系统及机制·····	419
附 录 大禹传说的西部底层·····		
一	文化底层的含义·····	447
二	禹出西羌·····	449
三	禹生石纽·····	453
四	导江为沱·····	457
五	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	459
参考文献·····		464
后 记·····		475

前 言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明起源时代长江流域政治组织的演进。

文明起源时代,是指文明诸要素相继诞生的时代。这个时代,一般认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晚期,或人类学上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 R. Service)在《原始社会的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中认为^①,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其中第三个阶段——酋邦阶段,即属于本书所说的文明起源时代,相当于学术界曾经说的原始社会末叶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提出“酋邦”(chiefdom)概念,用

^① E.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1971.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Toronto, 1975.

来表述一种既有别于史前部落又有别于国家文明的复杂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后经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弗里德(M. H. Fried)、桑德斯(W. Sanders)等学者的深入研究,这一概念和观点在国际上日益为更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学家所承认、运用并加以新的发展。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于运用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奴隶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来表述和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演变进程,对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则缺乏明确的模式加以表述,以致往往形成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近年学术界对此有所关注。有学者运用酋邦概念来分析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或从中心聚落形成的角度来探讨文明与国家的起源。

西方学者对从酋邦制社会发展到国家文明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洲、秘鲁、近东、西欧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西方学术传统所关注的区域,对中国的研究则由于其接触资料不多,而很少论及。中国学者近年开始运用酋邦概念来分析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尧、舜、禹之际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酋邦组织,以及中原酋邦向国家的转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初步进展。但在若干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远未取得一致认识。在长江流域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上,迄今除了个别学者从酋邦的观点分别对巴、蜀、滇和良渚文化进行了初步的个案研究外,还缺乏从各区域政治组织的演进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比较。

二

对于文明的起源,可以从物质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从物质文明要素而言,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四项要素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物质文明要素和标志,在某个地域内的某个社会中,只要同时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中的两个或三个,便可以确认这个地域内的这个社会已诞生了文明,进入文明时代。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m)则强调,至少要有城市、文字、金属器中的两项物质文明要素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里,才可以称得上文明^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衡量文明时代是否诞生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组织的发展变化程度,这个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因为,从纯粹的血缘组织发展变化为首邦组织,再从首邦组织发展变化为国家,这种发展变化从根本上标志着一个社会在经济分层、阶级划分、权力集中等最重要领域内的最本质的变化。

文明起源时代是相对于文明时代而言的,是文明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高度发展,推动着一些地区的一些社会中文明因素的萌芽和出现,促进了代表这一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素的逐个产生。从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看,早在龙山文化时代(距今5000—4000年前),黄河上游河套地区、黄河中下游河南山东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区出现了若干古城群,长江下游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黄河上游甘肃东乡林家出现了零星、小件的青铜器,黄河下游山东丁公出现了成行的陶文。这些古城、中心聚落、青铜器和陶器文字等,都是文明的物质要素,代表着当时各地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标志着这些地区已迈进了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不过,这些文明要素却不是同时出现在

^① Clyde Kluckholm, *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anding Society, City Invincible: An Oriental Institute Symposium*, 1960, p. 400.

同一个社会里的。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当时各地相应社会的政治组织中,还没有产生复杂社会的更高需要,还没有形成它的社会组织基础和经济技术条件。

虽然,单个出现的物质文明要素,一般说来可以产生在酋长制水平的社会,但是多项物质文明要素的集中出现或共同出现,却只能产生在国家社会,这是为世界古代文明史所充分证实了的。而这种物质文明要素与政治组织变化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是由于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带来的。不论物质文明要素是单个出现还是共同出现,它们都是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发生的,反映了组织结构的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程度。因此,政治组织结构对物质文明要素其实具有催化、阻滞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它提供了文明诸要素可能产生或不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背景,以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要素其实是政治组织变化过程中所先后产生的物质文化成果。从功能的观点看,这些物质文化成果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政治组织的变化及其需要所制约的,因而在文明诞生的过程中才出现了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那就是,有什么类型的政治组织,就会有什么类型的物质文明。当然,一旦物质文明要素产生后,就会从积极的方面推进政治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日益加深政治组织变化的复杂化程度,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政治组织的演进而言,文明起源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酋邦的诞生。酋邦是脱胎于传统部落社会,又打破部落社会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权力集中化的社会。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产生了凌驾于各个血缘单位之上的集中的领导权力,即最高决策机构,在明确的组织范围内行使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宗教)权力。第二,过去的各个血缘组织单位,现在成为组成这个酋邦的基本政治单位。

第三,出现了有序的等级制度,阶级划分逐步开始产生,但血缘纽带依然存在,酋邦以血缘单位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同时,酋邦的直接统治对象是血缘单位,而不是血缘单位中的个人。

从某些基本要素看,酋邦与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经济分层、社会分化、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的集中化、再分配系统等,是酋邦组织和国家组织都共同具备而为部落社会所没有的。但是,从本质上看,酋邦与国家又有着根本的差别。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国家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按照地缘而不按照血缘来划分国民;二是军队、警察、监狱等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国家的本质是暴力。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的两个特点,可以看作是国家区别于酋邦的两个根本方面。不少西方学者把酋邦组织称作“史前国家”,实际上正是基于酋邦与历史时期的国家所具有的这些根本差别。

三

长江流域文化研究,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进,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长江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以至研究其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甚至环太平洋地区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具有广阔的前景^①。

古代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都有着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有着辉煌的文明成就。秦汉之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中国有七

^① 段渝:《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见《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原载《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大经济中心，长江中游的江陵是一大会都，长江上游的巴蜀虽然包于关中，但关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巴蜀而富，《战国策·秦策一》说秦并蜀后：“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西汉成都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两汉之际五大名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蜀居其中。唐代，“扬一益二”，天下富庶尽在长江。过去史学界认为唐以前中国封建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五代时中国封建经济中心完成南移，现在看来还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唐以前长江流域并不是落后、蛮荒之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长江流域“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主要是指编户齐民，指被统治阶级。至于富商大贾家财累至巨万者，如邓通、卓氏等，并不在其例。三国时江东诸公，如果没有当地经济文化长期持续地发展，也不可能形成世族。至于考古学的发现，就更是为这些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史前长江上、中、下游密集分布的古城群和中心聚落，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大批的精美玉器，商代长江上游云南的铜、锡，四川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和黄金制品群，长江下游江西的大型青铜器群，江西、安徽早在商代就已开采的铜矿，都说明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既早，成就亦大。春秋战国时代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发祥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播染于巴、蜀、滇、吴、越，被及华夏、岭南。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正像长江本身一样，浩浩荡荡，生生不息。

古代以中原王朝为正统，把长江流域看成是蛮夷之地，文化上有边缘区之说。但是为什么每逢中原战乱，长江流域却成为残破的中原的支撑地？为什么长江流域地灵人杰，人才辈出？东汉末建安七子，荆州为三国鼎立局面提供了杰出的人才队伍？这些都足以引起重视，值得研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从文化而不是从王朝的正统观念上看，长江流域并不是什么边缘文化区，而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区之一。从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历史观出发，我们不能不说，

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立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要透彻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

四

大家知道,史前时代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要研究史前历史和文化,除了利用后来文献中的追溯而外,求诸考古资料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一般说来,在考古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它们来分析、认识古代政治组织某些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某一特定区域内几个相互联系的较大规模考古遗址的材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政治组织的规模、分布、性质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在长江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分别发现的大批成组、群分布的考古遗存,便属于这一类在其各自地域之内相互联系而又具有区域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由于长江流域史前考古材料的丰富性,尤其是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成批出现的史前古城或大型中心聚落的集中性,使得长江流域古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十分具有典型性,因而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进行系统研究,就是非常必要而自然的了。

本书力求充分吸收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酋邦与国家起源的理论成果,和近年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对长江流域各区域古文化演进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系统研究长江上游巴地、蜀地的古文化和金沙江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处于文明起源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组织及其演进,探讨政治组织演进过程中文明诸要素的产生和导致社会复杂化的各种机制,以及由酋邦组织向国家演化的不同方式和途径,并进一步研究文明时代初叶长江上游古蜀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与文明演进的关系,通过

系统地比较研究来揭示长江流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历史进程及特点,探讨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动力系统及其异同,以及文明与国家形成或未能最终形成的各种原因,力图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研究提供学术和理论上的一些新观点。

由于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进行整体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在材料、理论和方法上予以新的理解和阐释,才有可能深入系统地全面展开并获得创新性成果。本书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些尝试性探讨,抛砖引玉,求教于海内外博学君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学者指正。